廣東文史資料

50

797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广东文史资料

第五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文史资料
第五十辑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5印张 193,000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910册
书号 11111·214 定价 1.75元

目　　录

抗战初期我在广州的见闻…… 谌小岑（1）
抗日时期广东省政府播迁及我任平远县县长的忆述…… 秦庆钧（12）
抗战期中广东国统区的妇女组织及其活动…… 侯霭云（22）
战斗的八年…… 梅日新（34）
抗战期间台湾同胞在大陆的抗日斗争 …… 丘晨波（49）

抗日战争中的第四军…… 黄增章　黄子宣（67）
粤中区抗日战争七年亲历记…… 彭秋平（88）
澄海汕头沿海抗日的回忆…… 卞雅珊（103）
三罗抗日指挥部始末…… 张颖才　刘贻虎（112）
我在缅甸参加对日作战的回忆…… 胡醒唤（116）
回忆广东空军对日的空战 …… 陈　晋（122）

江门大良受降接收见闻…… 李益三 （139）

抗战时期国民党广东部队中的文化
艺术活动 …… 李　门 （157）
忆抗敌演剧一队在韶关…… 舒　模 （167）
我在香港及国内参加抗日工作的回顾…… 吴华胥 （177）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新闻界工作的回忆…… 姚汝明 （185）

何香凝、柳亚子在海丰的日子里 …… 袁　复 （202）
萧隽英与《群声报》…… 江　萍　何善丰 （213）

抗日战争广东战场大事记…… 梅　嘉　永　实 （21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抗战初期我在广州的见闻

谌小岑

一

一九三六年七月，蒋介石因收买了陈济棠的空军和余汉谋部，“统一”了广东之后，派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曾养甫为广州市市长兼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特派员的常务委员。曾养甫邀我去广东办党，据说是要把广东变成民国十三年的广东，好作为抗日根据地之一。我同曾养甫因在天津北洋大学同学的关系熟识，一九三四年我正失业，他邀我去杭州浙赣铁路理事会当秘书。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调任南京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又邀我去铁道部任劳工科长。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在他的联系下，我们正进行着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谈判。在谈话中，我经常把各方面，特别是李公朴等救国会的朋友们对国民党脱离工农群众的批评一再详谈过。当时国民党内部和与国民党接近的不少人认为：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放手发动全国农民和工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利用我国地广人多的优越条件争取时间，一旦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我国的变化，就可求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以国民党当务之急，在把全中国变成民

国十三年的广东。

我不是广东人，且曾几次参加反蒋运动，同C. C.没有渊源。所以当曾养甫把我提到国民党中央常会时，即遭到各方面的反对。但他终于力排众议，争取了发表我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书记长兼民众训练科科长。可是我和曾养甫谈好的放手发动民众运动的办党计划并没有实现。而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军队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之后，仅仅只有十天，广州就沦陷了，真是贻笑中外。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们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中到了广东之后，曾养甫要我同陈立夫（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常会的组织部长）谈谈办党的方针。我们一共谈了两个星期。第一个星期，我介绍了一些各方面对一九二七年以来国民党党务工作的批评——主要是离开了工农人民群众，专走官僚路线。他完全不接受，双方的谈话格格不入。第二个星期，曾养甫参加了谈话。总算在大敌当前，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放手发动民众的原则上，达到了一个初步的结论。但当九月二十一日，我们因纪念朱执信殉难到东莞虎门致祭之后，陈立夫特地到黄埔去见蒋介石，回来对我们说，蒋介石对办党的新方针表示不同意。蒋介石对陈立夫说："广东军人还怀疑中央，广西还没有统一，你还是照你的旧办法办党吧。……"实际上他并不想真正抗日，生怕人民群众一旦起来，对他的统治地位不利。可是曾养甫听了奉若圣旨，一再叮嘱我"不要乱动！"

二

在广州沦陷前的二年内，广东省的党政军内部已是矛盾重重。首要的是，陈济棠原有的军队并没有经过改编。黄慕松当了

省主席，对于原有的贪污县长一个也没有撤换，使这些人都怀着“五日京兆”的思想，拚命贪污。这种“换汤不换药”的“统一”，老百姓有冤无处诉，当然谈不上准备抗日的问题。

最初，余汉谋部下有人高唱“集会结社自由”、“积极准备抗日”等口号。但蒋介石带着各式各样的特务到了广东，“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日益加深。另外，无论是“中央”与“地方”的大员，其中不少人一听到要联合共产党抗日，莫不谈虎色变；有的则极端藐视共产党，认为共产党连江西的根据地也保不住，还有什么力量奢谈抗日？他们这类思想都是“七七事变”后在广东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莫大的障碍。

从一九三六年八月，到“七七”抗战发生，“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发展得很尖锐。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的委员们，几乎是清一色的CC分子，他们和地方上军政负责人处处发生摩擦，连他们自己认为应该办的“准备抗日工作”（实际是扩张CC势力的别名），一样都行不通。粤军副总司令香翰屏曾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公开登在报纸上，攻击曾养甫的广州市政措施，说是“苛政猛如虎”。

按照陈立夫办党的旧办法而成立的“党务训练班”有三百多学员，这些人实质上都是些官僚地主。当结业分配工作时，国民党省党部的委员们都争着想把和自己接近的人派到各县去担任县党部委员。当时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九个委员当中，除黄慕松病了以外，只有曾养甫一人代表“中央”。而余汉谋、香翰屏、李煦寰、钟天心、罗翼群、邓彦华等都属于“地方”，自然“地方”的人多。除了平远县党部是按照曾养甫以乡土关系提名通过的以外，其余各县党部都是“地方”委员们会外商定，交给余汉谋所推荐的组织科长冼家锐的名单通过的。以刘健群为首的“复兴社”分子对这三

百多人曾下过一番工夫，结果不仅在各县党务方面落了一场空，还遗下了后来遇事即发生的矛盾。就是说，“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由省扩大到各县去了。

原任财政厅长宋子良因病辞职，职务由曾养甫兼任。“党务训练班”的三百多学员中，有二十多人想干税务工作，我推荐他们分任各县税务局局长。其中有几个因明显的勒索贪污事件经人民举发撤职。这些情况都足以说明当时国民党基层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物。

黄慕松死后，吴铁城继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吴在广东替蒋集团在政治上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对人民、对抗日并没有作一点有益的事情。而在主席人选没有公布以前，曾养甫曾活动兼任，但没有成功，此事南京、上海、广州不少人都已知道。这又引起吴铁城对曾养甫的猜忌，双方达到了极不相容的程度，成为抗战前夕在广东政治上蒋集团内部主要矛盾之一。

三

“七七”抗战爆发后，广州有二十几个同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民训科有联系的青年，发起组织“青年救亡同志会”。在筹备期间，仅一星期就吸收成员将近一千人，有不少左倾分子参加，因而大遭地方军人之忌。又因参加这个团体的青年中有不少广州市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广州市社会局局长刘石心竟向曾养甫告状，说省党部民训科的活动不该以广州市的中小学教员为对象。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的常委余俊贤也说省党部民训科不该越俎代庖，侵入广州市青年工作的范围。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这个拟名为“广东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年救亡同志会”的团体就在“广东抗敌后援会”成立的这天，宣布解散。其中有几十个青年提出异议，不肯散会，乃决定另外组织一个专为出版刊物《救亡呼声》的团体，名为“救亡呼声社”。

可是，“抗敌后援会”和不久接连成立的文艺界和教育界的两个救国团体，都因没有深入群众，内部矛盾重重，没能展开救亡活动。

在广州沦陷前一年内，广东曾被称为“统一战线的模范省区”。原因是：（一）有几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廖承志、邓颖超、张云逸、潘汉年等，和另外几位非国民党的知名民主人士，如郭沫若、章乃器等到广州时，各方面都待之以礼。郭沫若且曾到处公开讲演，他主办的《救亡日报》，得到省党部的津贴在广州复刊。（二）国民党在广东省党部和广州市党部曾联合发表声明，主张联合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共同抗日。（三）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受到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民训科的掩护，得以公开活动，没有受到其他的阻挠。（四）工人的经济斗争没被当作非法事件处理。一九三七年底的榨油工人的长期罢工即其一例。（五）一般抗日的民主言论和集会结社比较自由，从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气氛较为浓厚。但是蒋集团的特务以及“复兴社”的人仍多方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仇视执行这一政策的进步人士。例如，郭沫若本来是我的邻居汪华贞邀到我们同住的楼房来作客的。由于我的爱人李峙山经常陪郭到处公开演讲，军统广东负责人李崇诗便借此当着我的面向曾养甫对我进行攻击，说什么我引来象郭沫若这样的一些左派人物在广州活动等等。曾养甫虽当场解释了一番，说郭也是同陈诚有关系的人。但却取消了他已答应发给郭沫若在广州恢复《救亡日报》以津贴的谎言。广东省党部的某些人员甚至在背后指责我是“共产党的书

记长”。

四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曾在庐山召集各方将领谈话，余汉谋也是被召者之一。后据余回来传达说，蒋介石曾说过这样的话：“日本人如果只要东三省，我宁可砍掉这条胳膊给他们，但他们得寸进尺，就只有诉诸战争了。”由此可见蒋曾决心出卖东三省。日本帝国主义不以占领东北为满足，继续南侵。“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来电报要调广东几个稍具战斗力的师到上海作战，余汉谋曾以“日军如在广东登陆时如之何”为理由，表示不愿意。蒋介石复电说：“日本人如在广东登陆，由我负责。”八月下旬，叶肇、巫剑虹、彭林生几个师便从广州开往上海了。不久又加派邓龙光师、谭邃师去保卫南京。这些部队从广州开拔时，士气旺盛，没有一人开小差的。到了上海仗也打得很好。但他们在上海南京沦陷之后，都没有回到广东。原来蒋介石的打算是在上海打一仗之后，就实行以张群为首的政学系“和必乱，战必败；战以后和，和以后安”的党国政策。其所以要调一些军队到上海阻击日军，是想打一次所谓“政治仗”，引起国际干涉，再进行谈判。他还认为广东乃英国的势力范围，日军不敢侵犯，英美派人物曾养甫也是这样想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起，日机一连几次轰炸广州，开始尽管有人持不同的想法，但对发动全省人民准备打游击的思想，还是少有的。

当时，广东各县农村有一些星散的武装部队，归香翰屏指挥名曰“保安队”。我曾与香翰屏谈到这些队伍不见得有什么力

量，但香翰屏也是相信日军不会打广东的，而他依靠那些地主武装队伍，主要是在防共。香曾对我说这些队伍可以防备共产党。

在"救亡呼声报"的座谈会上，当谈到如何发动农民组织游击队准备抗日的问题时，一个曾参加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的中共叛徒、中统分子袁洪范告诉我，有许多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农民运动领导人现在仍在香港。我们在一九三七年十月至十二月间曾同去香港几次，同这些人取得联系。据这些参加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对我说，他们在起义失败后，有三百多人逃到香港、澳门，同共产党失掉了联系。一部分人到南洋各地找亲戚朋友谋生去了。留在港澳的近两百人加入了第三党。到一九三七年秋为止，有一百多的人在港澳找到了固定的职业，主要是当海员、机器工人、汽车司机、码头工人、商店店员以及旅馆、茶室的服务员等，有四、五十人只当临时工，生活很艰苦。他们引我去见谭平山先生，我回到广州报告曾养甫后，同武汉方面取得了联系，把谭平山接回国来，送去武汉。

我们同这些广州起义参加者三十余人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否可回原籍组织武装队准备抗日？当时商讨决定，采取完全自愿的原则，凡是在港澳有固定职业者，或者环境不许可而感到有困难的，都暂不回去。结果报名可以立刻回去的只有二十八人，他们是属于南海、番禺、中山、海陆丰、潮汕、四会、台山、恩平等县的。岂知在十二月初，当五个人回到佛山时，就有两人被当地的保安司令部逮捕起来，关进牢里。我奔走营救无效，曾养甫也无可奈何。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中旬广州沦陷前夕，我到佛山才把他们保释出来。因此，其余未进来的，也就不敢回来了，从而组织游击队的事也就落了空。一九三八年二月初，港英当局又将香港海员工会封闭，因为海员工会在一九

三七年底曾成为海员开展抗日活动的中心。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广东军政当局忙于逃命，才不得不对组织抗日游击队作出决定：成立几个游击区。广州市郊区游击司令由曾养甫担任，他要我当秘书，在匆忙中发生了成立十二个游击支队的命令。其中第四支队是佛山"救亡呼声社"分社的社员组织的，由一个名叫黄侠生的青年任队长。这个支队曾给日伪以多次的骚扰与打击，并做了不少抗日宣传工作。由于黄侠生非共产党员，故与当地军队关系搞得还好，所以一直存在到抗战胜利之后。黄侠生的弟弟在战时被日敌逮捕，在佛山砍头示众的。

其余十一个支队的队长都是从香港回来的、曾经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农民运动领导人，但只有第二支队壮大起来，其原因是其他的支队皆受地方势力或汉奸进逼难于活动，其中有几个支队因人数少而归并到第二支队。第二支队队长吴勤，因其是个麻皮脸，故熟人皆呼他"麻皮吴勤"。迨一九四五年春，他被地主武装头子袁带诱捕杀害。吴勤这支队伍五、六年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曾给日敌多次重大打击。他们采取"斗智不斗力"的策略，引诱日敌扑空，趁其疲于奔命之时，破坏敌后交通，夺粮夺枪武装自己。一九三九年还得到香港同胞的支援购了一些盒子炮，队伍最多时曾发展到二千多人。

五

最后，我再说一下广州迅速沦陷经过的所见所闻。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后不久，日本空军连续轰炸广州，我们的高射炮部队也曾打下几架日本飞机。随后日本空军便改为夜袭，并发现有人在广州的飞机场附近发放信号。一天晚上曾逮捕

发放信号的汉奸一百多人。据供称，是有人从香港给他们带来金钱和信号弹。因此，对当时来自香港的旅客检查很严。

日本空军对广州市内初期的轰炸虽有几次，只是伤亡了不少居民，但未达军事效果。因之，随后日军的轰炸目标遂转移到粤汉铁路，但其命中率也很低，遂又集中轰炸铁路桥梁。广州市虽天天有警报，市内被炸的数次却很少，故当局与市民对战争的来临普遍存在麻痹思想，更为严重的是军队的备战思想显得特别麻痹。

一九三八年五月，香港曾传出日军在广东登陆的消息，广东当局也听到了，但未重视。十月十二日，日军在大亚湾（澳头）登陆的这天，正值中秋前夕，师长莫希德本人和连长以上的军官绝大多数都到广州过节去了。当十月十五日广州市的各个电影院急急映出"一五一师官兵迅即归队"的字幕时，惠阳实际已经失守了。

在这种敌人兵不受阻、长驱直入的情况下，广州之迅速沦陷是不可避免的。自惠阳失守的消息传出后，广州市民早已人心惶惶，有钱的人多逃往香港，西北沿江公路为逃难者所拥塞。最初，军政当局还故作镇定，到了十月十七日，政府不得不正式宣布准备撤退。"广东省抗敌后援会"在十月十八、十九两日内，于匆忙中将各机关的工作人员、学校教职员、一部分工商企业人员、人民团体成员等等，组成"抗敌工作队"，每人发给旅费二元，作为逃难津贴。二十日晚，除了不愿逃走的居民外，各机关学校均已撤空。军政负责人员大部分先集中清远、连县、翁源等地；一部分逃往西江。后来广东省党政机关改组，由李汉魂任省主席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省政府设在韶关。

广州市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曾养甫似乎早有准备的样子。他

带着广州市的抗敌干训队和财政厅所属的税警团退往四会、广宁等地，名义上是负西北八县的行政责任，实际上只是将税警团放在四会河口，阻击自三水来攻的日军，曾配合退到西江、北江的广东军队打过几次阻击战，使日军未得顺利西进。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也把全省分为九个"党务督导区"，我担任中区督导工作，包括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等县，我原计划第一步退到佛山后，再转顺德、东莞和游击队取得联系。

十月二十日夜半，我到了花地，见到我所委任的广州市郊游击队第二支队长吴勤，他已有二十多个壮汉在身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艰苦战斗生活。我向他们借了一床破棉絮，垫在那不平的小学讲桌上想睡一觉，恢复一下已经七十二小时没有休息的疲劳。刚躺下，就有空袭警报，有两架日本飞机夜袭广州。我的同伴已雇好一只小船，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要我坐船前往佛山。在小船上，我为我们就这样轻轻地把我国的华南重镇——广州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了而悲愤交集。

十月二十一日天明时，船到了一个乡村。那里的保长是"救亡呼声社"的一个社员。这位青年热情地接待我们到一个茶社洗脸、吃点心。我们进去时，已有二十多个老年人默默地坐在那里饮茶，他们对广州沦陷若有所思，而又不敢有所表示的样子，望着我们这批逃难者。广州市传来了机器工人和工兵队正在破坏电灯厂和自来水厂的大爆炸声。到了佛山后，同"救亡呼声社"佛山分社的成员开了三天会，讨论了今后进行抗日工作的诸多问题。

在佛山知道日军的先遣队是十月二十一日下午进入广州的。他们只有几十个人分乘十几辆两轮摩托车，后面插着一面两尺见方的膏药旗。每辆车旁挂着一辆拖车，车上站着一个日本兵，手持卡宾枪，沿途射击行人。日军从大东门进城，转永汉路、长

堤、西关，再往东，由东门出城。当晚才有少量日军分批进城，分驻各处。二十二日一早市内各路口出现日本哨兵，每一路口有几名穿着同样黑色衣裤的汉奸对过路的人进行搜身检查，没收行人的贵重财物。同日下午日军伙同汉奸多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劫掠，所有大商店的门窗悉被击破，掠去大批商品。二十三日晨即有几处起火。二十四日晚当我们离开佛山时遥望西南城一带已是一片火海。当晚我们经过三水、西南两地时，都见当日敌机所投的燃烧弹起火仍未熄灭。我们到达四会只见旅店、茶楼、饭馆都住满了人，难以落足。因此连夜赶至广宁，我们一直在广宁住了三个多月。

我们在广宁听到日军的广播：在这次攻占广州的战役中，自大亚湾登陆之日起，到进入广州为止，日军仅死亡六十三人。

香港舆论对广州这次沦陷之迅速结合四个军政负责大员的姓名给了他们四句评语：

希德不德，余汉无谋，

吴铁失城，曾养冇甫①。

这既是对他们绝妙的讽刺，也是人民对当局守土无能的愤懑斥责。

〔注〕

①“冇甫”与广州方言“无谱”谐音，意为事情出乎情理之外。

抗日时期广东省政府播迁及我任平远县县长的忆述

秦庆钧

我一向在广东省政府或其属下单位工作，广州沦陷前，我任广东省营工业管理处会计主任。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下午，我带领广东省政府建设厅及省营工业管理处职员一百多人连同档案帐册文件，另工业产品两船，离开广州直趋肇庆，原拟等候建设厅长兼工管处长徐景唐回来处理，但当时徐赴重庆未回，遂将工业产品运梧州发售，档案文件则秘藏于云浮县的云龙乡。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李汉魂主席开府曲江，我奉命由南路经广州湾至香港，再转汕头、潮安至曲江交代。其后，我先后任广东省政府建设厅、财政厅会计主任。一九四三年五月奉派为平远县县长，一九四五年曲江沦陷，广东省政府经龙川而迁至平远。直至日寇投降，我随同省政府复员回广州。故抗日时期广东省政府的播迁，我始终参与其间，现忆述如后，以供参考。

一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七日，广州市各界七万多人，举行游行示威，决心保卫广州。二十日，敌军主力即在飞机掩护下直扑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